



促成每一次器官捐献者与受助者的生命连接,都需要协调员与医院付出很多努力

奔波于死生之间的 摆渡人

被颜值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

一个生命逝去,数个生命重生。这不是神话传说,现实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穿梭于死生之间,构筑一个个生命的奇迹。撮合人体器官捐献,让衰颓的生命重现蓬勃。

冲刺48小时

7月4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90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秀芝接到一家医院的电话,一名身患重症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男孩入院后脑血管出血,情况危殆。按流程,赶到医院的吴秀芝需立即将病人病历拍照发给湘雅二医院OPO(器官捐献办公室)负责人郭勇,补充CT、B超图像等,由后方评估捐献器官的可能性。

下一步的关键是医生对病情的判断,还有家属是否接受。吴秀芝说,此后主治医生的诊断介绍,也是家属能否认同器官捐献的重要原因。

抢救没能挽回生命,医生判断男孩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在吴秀芝和医生的劝说下,悲痛的父母表达了捐献器官的意愿,他们希望能在他人身上看到儿子的存在。

湘雅二医院评估的结果是器官捐赠可行,正要实施手术时,男孩父亲提出希望按照家乡风俗,阴历二十七(7月6日)过后再做。为了尊重家人意愿,吴秀芝联系对方医院继续保持治疗,并在医院跟踪进展。

7月5日凌晨5时,长沙铁路医院的医生来电,另一位患者家属有意捐献器官。

两次OPO工作形成重叠交叉,这在单个工作人员的经中都是罕见的,工作量极其繁重,稍有差错,就会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

新的捐赠者是一位来自四川的患者,乘坐火车经过长沙时突然脑出血。7月2日收到讯息后,吴秀芝来到医院与患者家属联系,对病情进行评估后,经过多次沟通,得到了家属的理解。

7月5日凌晨,这位患者病情恶化宣告不治。来不及吃早饭的吴秀芝驱车直奔医院,在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协调各个医院部门,签订文件收集资料,联系本院医生来进行手术,计算患者余下的医药费用、发放补助,安抚家属。

这次捐献的肝脏和眼角膜,可以让一名肝病患者有复生的希望,两人重见光明。

从凌晨5时到12时,吴秀芝需要在不同的楼层来回奔波,为了协调医院各个部门,并及时跟家属沟通解释各个环节,她手机满格的电量很快就被清零。7个小时忙下来,吴秀芝觉得自己好像也清零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让吴秀芝欣慰的是,在送她上车时,器官捐赠者的家属含泪向她致谢,快回去休息吧,你们是真的把这当成了事业的人!

人家刚奉献了大爱,却还在关心你,一下子存在感恩爆。吴秀芝说,她简单吃了个中饭就赶到另一家医院,对那个男孩的病况做跟踪、评估,并预先联系好前期的工作安排,直到深夜才回家。

第二天一觉醒来,吴秀芝又立即赶到这家医院,将上一个捐献者的功课,几乎重复了一遍。直到7月7日凌晨3时,那个脑出血的男孩被送入手术室。男孩的肝脏捐给了两名患者,加上肾脏和眼角膜,6个人的生命由此焕发新生。

回到家中,拖着身疲惫的吴秀芝在父母关爱的目光中倒床就睡。4年间,这个年轻的90后在同事们的支持下,成功协调完成了70多例捐献,帮助逾百人获得新生。

凌晨3时的砸门人

长相甜美心思灵巧的吴秀芝的业务分区是在长沙市内,而1991年出生的马望宗则和另一名男同事被派往湖南省西部的怀化市抓业务。

初入行时,他曾遭遇了惊险一幕。2014年湖南省邵阳武冈市,四川某地的一个团队到当地包了一个工程项目。不久,一名20多岁的工人在工地上出了安全



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致敬。

郭勇摄

事故,经过一番抢救仍无法挽回该男子性命。武冈市人民医院的科主任向男子父母介绍了器官捐献的工作后,哀痛的家属最终决定联系湘雅二医院捐献孩子器官。

马望宗和同事驱车疾驰而去,在凌晨3时左右与家属见面。

到医院与家属在医生办公室交谈不久,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和凶狠的叫喊声,数个拳头用力地砸在大门上,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瘆人。

刚出道的马望宗壮着胆子询问对方的身份和来意,几名壮汉声称是受伤工人的兄弟,并威胁马望宗不要跟自己的母亲乱讲话。

我当时一头雾水,但记得这个工人是独子,没有兄弟,心里便怀疑有诈。身材壮实的马望宗一边将门打开一条缝,一边用脚死顶门沿,大声与对方沟通。

一番对话后,他才明白,来的是包工头一行人,他们担心伤者父母喊来律师要赔偿加价,于是带人过来闹事。得知真相后,这伙人才悻悻而去。

以前人们的认识没有这么清楚,甚至还有误解。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多,民众知晓和理解的也越来越多。7月8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OPO负责人郭勇介绍说,目前他们科室10人,8人分别跑各个片区。除此之外,一人为85后,其余都是90后。这些年来,在两代中青OPO工作者的努力下,完成了800多例器官捐献工作,挽救的病人约为2500人,占湖南省内总捐献数的三分之一。

郭勇回忆,当年他是跟随博士生导师、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彭龙开教授开始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由于民众不解,遇上吐口水、打人的情况并不罕见。

2012年左右,刚满30岁的他闻讯赶到一家医院与伤者妻子协商器官捐献之事。正在悲痛中的妻子闻知来意后,盯着他看了一会,称她去商量下就回,让郭勇就地等候。

结果几分钟后,迎来的却是七八个气势汹汹的壮汉,口中嚷嚷着要教训那个搞器官的。亏得他反应快,飞速跑开才得以幸免。

湘雅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该院OPO开创者彭龙开说,2010年全国有10个省份开始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之后名单里添加了湖南。2011年湖南做了7例,2012年做了7例。当时,这在民众心里产生了震动和冲击。

那是一个肝脏损伤的患者,他去世后捐献了一对肾脏。当时记得,捐献与需求几乎是1:200。他回想,当时有些患者经济

条件不好的,或者轮候不到的,就直接放弃了生的希望。

捐献与需求的巨大落差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多位接受采访的OPO人士表示,在政府动员和媒体的频繁报道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器官捐献的理念。

常年奔波于湖南省西部地区怀化市下辖几个县区的马望宗透露,当地卫生部门开医院工作会议时,都会强调对这项工作要给予支持,并层层传达,为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巨大方便。而实际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中,那种言语激愤甚至动手的情况已经罕见。

2015年1月16日,知名歌手姚贝娜因病去世。她弥留之际提出,把遗体眼角膜捐献出去。姚贝娜的大爱之举为4名患者带去光明,被媒体广为报道,这项让生命接力前行的事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2019年5月21日,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淳口镇高田村,88位村民做了一个刷新传统丧葬观念的决定——集体签署志愿书,在去世后捐献遗体器官。

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如果能救别人,何乐不为?时年56岁的高田村村民朱际葵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妻子周世贵和儿子朱涛也在一旁填表,签下遗体器官自愿捐献协议。

2020年5月,本该参加当年高考的湖南女孩薇薇不幸查出伯基特淋巴瘤晚期,原本温馨的家庭瞬间冰冷。弥留之际,女孩却想着尽最后的力量回馈温暖过她的世界,让母亲在她去世后将其遗体捐献。薇薇去世的第二天凌晨,母亲同意了遗体捐献。她说,那一刻想起了女儿坚定的眼神,更想让孩子走得有价值。

据悉,截至2021年7月15日,全国已有3557022人登记捐献人体器官。截至今年6月30日,累计实现捐献35030例,捐献器官103293个。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关于生命与希望的温暖故事。

让人感动的除了生命重 生还有人性光辉

湘雅二医院OPO负责人郭勇称,从已经捐献的800多人看,疾病与意外伤害各占一部分。其中低龄龄段的小朋友,约占了10%—15%左右。18岁到40岁这一年龄段总数30%左右。这是因为工作意外和交通事故居多。40岁—60岁的捐献者多是因为身体健康原因。而为了搭桥,促成捐献者与受助者的生命连接,协调员与医院要付

出很多努力。

他说,国家法律规定,当患者心、脑死亡时才能做器官捐献。而依照流程,患者的临床医生确定病人无法拯救后告知患者家属时,有些医生会在之后征求家属意见。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没有临床医生和主任、分管院领导的支持,从我们的数据来看,没有一例可以成功。郭勇说,这是因为在接受治疗时,患者家属与医生会产生紧密联系和信任。没有医生的推荐,作为外人的协调员不会得到家属的理解,何况当时家属往往正处于最痛苦的时刻。

按照目前的法规,诊疗医生和医院几乎是无偿地支持这一事业,却会给他们带来不少的烦恼:原本可以离开医院的患者要继续留到重症监护室,一天几千上万元的费用,对患者家属也是负担。而管床的医生和护士要继续监护,新的病人进不来。

最让医生头痛的是,万一有其他因素家属闹事,麻烦更是一堆。

数据显示,理解但不愿意具体支持这一工作的医疗机构,仍占有相当比例。OPO最基础的环节,是患者家属的支持。考虑到做出无偿捐献的家庭在医院诊疗期间会有巨大开销,政府规定,实施移植手术的医院在费用中提取部分用于补助捐献者家属。实际上这笔开支往往会用于结算捐献者的医疗欠费。

多年数据显示,湖南省境内参加捐献的患者平均每人大致会因此结算3万—5万元的医疗费用,这几乎相当于基层县医院一周左右的ICU病房费用。

而具体促成捐献成功的因素,还包括对患者病情的细致评估,协调员苦口婆心地劝说,或动之以情或晓之以理。

吴秀芝直言工作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

一方面同情患者和家属的痛苦,另一方面又知道患者的离去有机会让其他人获得新生。家属期望亲人能早日恢复,而知情的你感同身受,只能小心地触碰那个敏感点,在这种矛盾中反复来回。

她回忆在7年工作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甚至让擅长交流的自己都压抑得难以启齿:一个名叫羽翔的男孩,患有脑血管畸形,在重症监护室救治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挽回生命。在孩子2岁、6岁时,脑血管畸形,这颗埋在孩子身上的不定时炸弹,曾两度威胁到其生命,都是几经抢救才挽回。

我看着她,无数次祈祷,无数次失落,哀伤一点一点地抽走她的坚强意志。你真不好开口去打搅一个多次从死神那里要回孩子的母亲,只能给予无声的陪伴。吴秀芝说,出乎意料的是,当她小心翼翼地提议

捐献器官时,却获得了同意。羽翔的妈妈,说羽翔从小有一颗善良的心,母子俩走在街上,看到乞讨的人,总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看到汗流浹背的环卫工人,孩子总会要求妈妈,去买水给他们喝。

这位即将与儿子生离死别的母亲坚持认为,孩子一定愿意在离开人世后为能帮助别人延续生命而自豪。

吴秀芝说,签署器官捐献登记表那天,天寒地冻,但她心中却充满了感动。不仅仅是又将有3个生命因此得到重生,更多的是因为这对母子散发出的人性光辉,让她分明感受到一次生命的洗礼。若干年后的医师节,她曾在人民大会堂向数千名代表讲述了这个故事,期望这样的善举被更多人传递。

扎根怀化的马望宗感同身受。他认为,工作中这样的情感拉锯和洗礼,精神压力相当大,一种难以名状的纠结,是驱使他前行的动力,也是一种束缚。

他表示,虽然部门没有硬性的指标考核,但是既然担负这一职责,就得不断努力。然而,在一些偏远山区,地方风俗也会对捐献工作造成意外的困难,甚至占拒绝总数的六成以上。很多家属其实愿意,但他们不想回老家后被人指指点点。

他建议学校教育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或者推行一些讲座,年轻一代的观念改变了,就能坦然面对类似的事情了。

800户 亲属

6月22日上午,郭勇的手机急促地响起:一个湖南邵东县的捐献者家属来电求援,自家弟弟摔伤了,并且可能视神经损伤。由于这个手术当地县医院做不了,他期望到湘雅二医院来就诊。但当前湘雅二医院眼科住院没床位,担心会耽误对方治疗,于是郭勇给湖南省人民医院的朋友打电话,希望能帮一次忙。

你买了一台车,4S店会给你做售后服务。捐献者是挽救过别人生命的人,我们自然也要做免费的售后服务,帮人联系看病。郭勇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相当于800多个捐献者家庭的家属。在做器官捐献协调工作时,他和同事与捐赠者家属无形中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和联系。他们看病遇到问题,很多人都去找过。

郭勇坦言,求援的人数多了后,现在他们已经明显力有不逮,难承重负了。为此他曾和湖南省红十字会提出多次建议,组建相关的志愿服务队伍。他举例说,依照目前速度,10年后医院OPO接受的总捐献人数会超过2000个,2000个家庭的医疗援助和联系显然不是他们科室10个人能担负的。

协调员吴秀芝也有同样境况。她说,就在7月10日,一位捐献者的家人打来电话,说父亲脑梗中风了,想寻求帮助到神经内科住院。因家人没人学医,此前有什么身体不适就会让吴秀芝帮忙看一看,或者帮他们到医院去找教授看一看。

一位协调员表示,过年时常收到捐献者家属的短信,嘘寒问暖,让人很暖心。尤其年长的老人,他在心里会把你当成一个亲人,当他原来的孩子,成为一种寄托。而遇到这种亲人求助医疗服务时,他都会认真去落实,唯恐辜负这种信任。

湘雅二医院移植科主任彭元凯透露,经过10年的发展,器官捐献日渐为人熟悉,而随着国家医疗水平和保障能力的提升,加之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对于医疗服务有更高需求。从移植手术的数据分析,需求与捐献之比仍然高达30倍之多。而另一方面,全国百万人的捐献率只有百万分之四,与欧美国家相比不到十分之一。

很多病人因为等待过于漫长而丧失了机会。

郭勇说,在常年的奔波中,作为一名资深OPO人士,他能深切感受到同事们在器官捐献的成败交替中聚集的负能量,既有被使命催促的压力,也有亲历生死离别的苦闷。迫切需要有一种心理咨询和减压机制,能让从业者驱散心里的阴霾。他说,可能不仅是他说在医院的同事们,整个湖南10所能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那些常年从事OPO的从业者,都迫切盼望职业环境的优化和改变。

难管的90后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动职场文化

□ 胡波

自90后进入职场,年轻人越来越难管的声音就不绝于耳。追求自我张扬个性,抗拒说教,频繁跳槽,寻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这些耳熟能详的词语,已成为年轻人的标配。

无独有偶,最近有媒体报道,韩国90后也是如此,在《90后来了》一书中,CJ集团品牌经理林洪泽发现,韩国90后步入职场,对原本韩国的职场文化造成剧烈冲击:90后视准时下班和休假为天经地义、抗拒权威主义和说教、对企业没有多少忠诚度,他们只忠诚于自己的选择、反对加班文化。

有关90后难管的话题,社会上已有很多的讨论,一种主流的观点将之归结于不同代际之间思维模式的差异。70后、80

后辈们掌握了决策权与话语权,面对90后的群体依旧采用既定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从而产生一种错位、不匹配,因此不是90后难管,而是企业不会管。

这种语境下,已有企业认识到管理上的问题,在制度和策略上作出调整,以适应年轻人。凡此种种,不得不让人思考:难管的90后是否能撼动固有的职场文化?有人甚至预测,未来当90后们成长为管理者,完全掌握职场话语权,就会给职场文化带来彻底的改变,这样的判断是否过于乐观?

首先,年轻人的诉求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不可能指望每个单位都能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美好,那只不过是个人的一厢情愿罢了。在大学毕业后生过剩的年代,多数用人单位依旧是强势方,你不干,自会有人愿意干。

面对职场年轻人的诉求,有的企业会

作出一些调整,有的却转身很难。因为管理既是一种思维和格局,也是一种技术和能力,有些用人单位本就面临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管理上甩不掉、积重难返,在没有遇到重大危机之前,让他们作出调整和改变是很困难的。

其次,职场文化所滋生的职场规则,有其相对稳定性、甚至顽固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比如,35岁的职场分水岭一旦形成,年龄歧视很难打破,行业内竞争激烈,996工作生态、形式主义的加班文化,并没有因为外界关注而出现明显改观;学历歧视、职场酒文化等,虽然跟具体的单位、行业有一定联系,但更多的是由整个社会文化和氛围所铸就的。

再次,90后群体也是多元的,对待90后也要分类看待,不能一刀切。媒体报道之下,这个群体有被单一化、夸大化的成分。有调查显示,90后的平均跳

槽率是0.91次/年,也就是平均1.09年换一次工作,有40%以上的90后从未有过跳槽行为,34%的90后仅有一次跳槽行为,绝大多数90后跳槽行为并不频繁。换言之,调查样本的多少、行业企业面向的取舍,都会影响人们对这一群体的概括和判断,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并不全面。

单从个体角度看,面对职场的强势文化,很多90后都能快速地适应、接受乃至继承现有的文化和规则,而有些年轻人甚至在抗拒之后会发现自己也无力改变,还是得去适应现实。

群体关联。

也就是说,90后群体的年龄也在不断增长,一旦过了35岁,又会面临00后这个年轻群体的竞争与冲击。当年龄上不再保持优势,是适应用人单位,接受现有的规则系统,还是保持自我和放飞个性,对僵化的制度始终产生抵触,相信年轻人都会作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不可否认,难管的年轻人会对职场文化带来一定冲击,但用人单位应对冲击、作出改变,注定是渐进式的,而非激进式的,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彻底扭转。职场文化生态一旦形成,既有创新性,也有保守性的一面,年轻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冲击现有的职场文化,很难作出整体的判断,还需要管理者、年轻人在接触与碰撞中,互相适应、调整 and 改变,而不是只苛求一方去迁就另一方,不妨拭目以待,通过更长的时间来检验。

一个层面看,当今社会,貌不出众,无法改变和弥补颜值不足的人,同样能取得成功。他们不用把太多时间和精力花在容貌和身材的修饰管理上,而是把热情和专注力投入到社会需要和自己热爱的事业中去,用实力证明存在的价值,争取到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通过加快事业发展的步伐,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这样的成功,比单纯依靠外表取悦别人,无疑要更加可靠和持久。

为颜值焦虑并不完全是年轻人自身的错,也有商业社会各类广告夸大营销和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年轻人要找准人生的方向,学会扬长避短,毕竟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